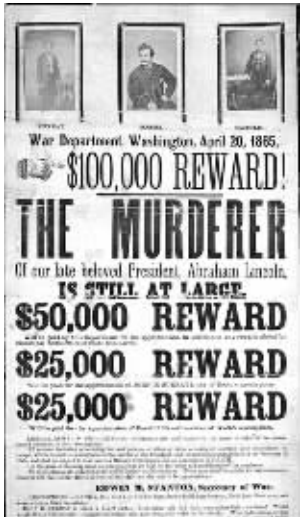


1865年7月7日十三点半左右，美国总统林肯遇刺案中唯一一名女性嫌疑犯玛丽·苏拉特被处以绞刑，成为美国建国以来第一个被处死刑的女性。行刑时，行刑官取下玛丽的帽子，给她头上套了个白布口袋。玛丽抱怨说手被绑得太紧，让她胳膊很疼，行刑官告诉她：“不会疼太久的”。当一个士兵让玛丽往前移动时，玛丽说：“请不要让我掉下去。”她的这最后一句话，被评为历史上最著名的20句遗言之一。

美国历史上首位被处死刑的女人



林肯遇刺案的悬赏令
资料图片



玛丽·苏拉特
资料图片

南方支持者走进剧院 朝林肯的脑袋开枪

1865年4月14日，美国“南北战争”刚结束没多久，林肯决定携夫人去华盛顿的福特剧院看戏，剧院将上演一部流行喜剧《我们的表现良辰》。当天中午，约翰·威尔克斯·布斯来到剧院取邮件，当他得知林肯总统晚上要来剧院看戏时，激动得浑身颤抖。

布斯是个深受美国女性喜爱的男演员，是坚定的南部邦联支持者。内战期间，布斯就曾组织了一群人暗中活动，打算把林肯绑架到南部邦联首府里士满，以此要挟北方邦联支付大笔赎金并释放南方军队被俘人员。

但是，南方军队节节失利的现实，让布斯逐渐认识到即使绑架林肯也无法扭转南方的败局。布斯和另外3个同伙开了个会。这是团伙第一次策划与绑架无关的行动——布斯单独去刺杀林肯；乔治·阿茨罗德的任务是杀死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大卫·赫罗尔德掩护路易斯·鲍威尔刺杀国务卿威廉·西沃德。

4月14日晚饭后，布斯回到旅店楼上休息片刻，8点左右，他找到其他3个同伙，约定按计划行事，得手之后在海军部大桥见面，如果不能及时赶到那里就去马里兰州的苏拉特村会合。

9点钟过后，布斯来到剧院后台，穿过舞台下面一条通道，走进隔壁一间酒吧。当第三幕第二幕将近结束的时候，布斯决定开始行动。他进入通向总统包厢的走廊，本来应该在这里驻守的卫兵约翰·派克却找了个位子去看戏。

当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大笑时，布斯立刻推开包厢的门，拔出一支口径为44毫米的大口

径短筒手枪，对准总统的左耳上方开了一枪。

林肯的身体稍稍前倾了一下，接着就仰面倒不省人事。布斯被众人围追，从11英尺高的包厢摔到舞台上，左腿一根腿骨折断。他忍痛跳起来，用法语对观众嚷道：“这就是暴君的下场！”尔后，冲过舞台跑出剧院后门，在小巷里跳上马，仓皇逃走。

凶手住过玛丽的旅馆 并从她那得到帮助

与此同时，在赫罗尔德的帮助下，鲍威尔潜进了国务卿威廉·西沃德的家中，西沃德几天前从马车上摔下来正在床上躺着养伤。鲍威尔接连拿刀刺伤了西沃德的二子一女还有一名男护士及一名国务院信使，西沃德本人则由于身上打着钢板保护，未受致命伤。当鲍威尔从国务卿家中逃出时，发现接应他的赫罗尔德早已开溜，鲍威尔只好只身逃离了现场。负责刺杀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的阿茨罗德在一个酒吧里喝了一杯又一杯，始终没有勇气去执行任务，最终还是临阵退缩了。

当晚，布斯在苏拉特村与赫罗尔德相逢。两人在村里一个小酒馆取了卡宾枪、威士忌和一只望远镜，然后继续逃亡。案发12天后，追兵才在皇家港附近一个存放烟草的棚子找到他们，赫罗尔德投降，原本被命令活捉的布斯被一名士兵开枪打死。

4月15日，作战部长（相当于后来的国防部部长）埃德温·史丹顿发布通缉令，悬赏10万美元抓捕布斯及其同伙。跟刺杀案有牵连的人纷纷被收押，包括玛丽·苏拉特。

她是一名寡妇，她的儿子约翰·苏拉特在内战中支持南方，经常穿梭于火线，向南方传递情报和运送物资，担任南方军队的向导，并曾参与了此前未遂的绑架。布斯行刺林肯时，约翰·苏拉特不在华盛顿，和刺杀行动无关。但是玛丽·苏拉特在华盛顿开了一家寄宿旅店，布斯团伙的大部分人都住在这里，布斯本人也经常来这里和同伙们密谋。

另外，马里兰州苏拉特村的小酒馆也属于玛丽·苏拉特，被她租给了一个叫约翰·劳埃德的人，布斯在逃亡中在这里和赫罗尔德相会，并取得了步枪等装备。

公愤影响了判决 玛丽·苏拉特被处绞刑

玛丽·苏拉特是4月17日被逮捕的，警察对她屋子搜索时发现了布斯的照片，藏在其他照片的后面。此外，警察还发现了南方领导人的照片，以及一把手枪、子弹和雷管。正在警察搜查的时候，化了装的鲍威尔出现在玛丽家的门口，尽管玛丽否认她认识鲍威尔，但是警察还是把鲍威尔逮捕并认出了他就是袭击国务卿的凶手。这一点对后来玛丽在庭审时的辩护非常不利，当局认为她一开始就撒了谎。

1865年5月9日，对林肯遇刺案嫌疑人的审判开始。先前被关押的大约400名受牵连者大都涉案不深，他们以出庭作证而被免于起诉。真正站在被告席上的

只有8个人，玛丽·苏拉特是唯一的女性。庭审在1865年6月28日结束。6月30日，军事法庭做出了判决，8名被告均有罪，其中路易斯·鲍威尔、大卫·赫罗尔德、乔治·阿茨罗德和玛丽·苏拉特被判处绞刑。7月5日，这个审判结果被公之于众，鲍威尔在得知审判结果后，作了一个声明，宣称玛丽是完全无辜的，不过对审判结果已经不起任何作用。

当时美国群情激愤，媒体也不支持玛丽，为了平抑民愤、安定人心、震慑蠢蠢欲动的南方势力残余，由9名军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能让当权者更容易地得到自己想要的审判结果。

“请不要让我掉下去” 成为最著名遗言之一

7月6日，玛丽被告知，她将于第二天被执行绞刑。直到最后时刻，她的两名律师艾金和克兰皮特都没有放弃挽救玛丽生命的努力，7月7日凌晨3点，他们从华盛顿特区法庭搞到了一纸人身保护令，认定军事法庭在平民身上没有司法权。然而，约翰逊总统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作出反应，将人身保护令撤销。

7月7日12点30分，士兵们命令所有探视者离开。十三点一刻，在一支队伍的押送下，四名死刑犯穿过庭院走到绞刑架前，玛丽走在最前面，一身黑裙，戴着面纱。之后，行刑官取下玛丽的帽子，给她头上套了个白布口袋，玛丽抱怨说手被绑得太紧，让她胳膊很疼，行刑官告诉她：“不会疼太久的”。当一个士兵让玛丽往前移动时，玛丽说：“请不要让我掉下去。”这是她最后一句话，被评为历史上最著名的20句遗言之一。

1865年7月7日十三点半左右，玛丽·苏拉特成为美国建国以来第一个被处以死刑的女性。

对她儿子约翰·苏拉特的抓捕也在进行中，埃德温·史丹顿开出的赏金高达2.5万美元。不过，玛丽被处死以后，似乎史丹顿对约翰丧失了兴趣，约翰后来逃到欧洲，最终被抓捕回国。这一次是一个民事法庭对他进行审判，由于缺乏证据，陪审团难以达成一致，最终约翰·苏拉特被无罪释放。

然而，林肯遇刺案并没有尘埃落定，布斯背后的指使者到底是谁？有南方邦联国务卿犹大·本杰明、国际金融巨头罗斯柴尔德家族、梵蒂冈教廷这几种流行说法。

还有很多人将矛头指向北方联盟内部：比方说，为什么三起刺杀预谋偏偏针对安德鲁·约翰逊的那一起没有实施？而约翰逊继任为总统，算是林肯遇刺的既得利益者。为什么布斯的暗杀计划没有包括埃德温·史丹顿？在战时，他的权势和对北方联邦的重要性仅次于林肯。

布斯被击毙后身上的日记本被交给埃德温·史丹顿，等到庭审时这本日记再次出现时，缺了整整18页。有人认为埃德温·史丹顿才是刺杀林肯的幕后黑手，他希望对南方实施一种更为苛刻的重建政策，而林肯不同意这么做。史丹顿1869年去世，许多秘密也随之被带进坟墓。

上林《文史参考》

辛亥元老郑烈 与曹禺的翁婿之交

郑烈，辛亥革命元老，我国杰出戏剧家曹禺第一位夫人郑秀的父亲。郑秀是清华大学法律系学生，身材苗条、面容清秀，一副大家闺秀的仪表，是清华园的“校花”，追求她的男生不胜枚举。比他高两届的曹禺，是清华外国文学系的学生。他久仰郑秀的芳名，一次初见，便与她有一种亲近感，狂热地追求她。在交往的过程中，郑秀很喜欢谈论宠爱她的爸爸郑烈。于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辛亥元老的形象，在曹禺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

驱鞑虏黄花岗九死一生

郑秀的父亲郑烈，字晓云，福州人，和辛亥先烈方声洞是至交。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在孙中山先生主持下，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11年，郑烈与方声洞一起，在同盟会最高军事指挥员黄兴策划下参加广州起义。

起义缺乏武器，方声洞、郑烈等商议，事先买了一口大的楠木棺材，将武器放在空棺内。进广州城门时，清官喝令开棺检查。方声洞急中生智，谎称开棺钥匙忘带在身边，同时又给清官塞了一些好处费，这才将棺木运进城。不料起义时，寡不敌众，方声洞、林觉民等许多人在战斗中牺牲，方声洞身中数枪。也有的人受伤被俘惨遭杀害。事后收拾烈士遗骸72具，合葬在广州城郊黄花岗，这就是民国史上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听父亲说，在这次起义中，他幸免于难。他和辛亥元老胡汉民一起从死尸堆里爬了出来。胡汉民抱了一把胡琴化装成京剧琴师，父亲化装成邮差，才逃出封锁线，捡回了一条性命。方声洞视死如归，舍生取义。广州起义前一夜就写好两封遗书，一封给父母，一封给妻子王颖。在给妻子王颖的遗书中，方声洞写道：‘刻吾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亦可以无憾矣。’并叮嘱妻子他死后要‘教旭儿长大一定要爱国。’旭儿指的是方贤旭，他生于1910年，和你同年。二姨罹难时，他刚满周岁……”听着郑秀满含深情的描述，曹禺对尚未谋面的未来岳父及满门忠烈的方氏一家充满了崇敬之情。

翁婿畅论《精忠柏》

1934年到1936年，曹禺的两部大型话剧《雷雨》《日出》先后发表，轰动全国。1936年秋，曹禺来到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后改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在郑秀的引见下，拜会了仰慕已久的郑烈。

年过半百、喜欢舞文弄墨的郑老先生对话剧创作也发生了兴趣，试着写了一部多幕话剧《精忠柏》。他让秘书用毛笔认真誊抄了一遍，亲自“请家宝斧正”几个字，送给曹禺过目。剧本写得不错，既不像京戏，又不像文明戏，但曹禺仍恭恭敬敬地提了一些修改意见。郑老先生看了连连点头：“讲得极是，讲得极是。”

为了进一步修改剧本，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加深对曹禺的了解，郑烈多次邀请曹禺到他寓所，南京山西路一幢带车库的洋房里详谈。

郑烈的《精忠柏》写得很长，取材于宋朝岳飞抗金的历史题材，从岳母刺字、受宗泽重用、朱仙镇大捷，一直到十二道金牌召回、风波亭遇害等情节，都写得十分详细。郑烈当时任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负责检察署、监狱等部门，他又是辛亥元老，因此曹禺在他面前十分谦恭，敬称为“伯父”。

但谈到剧本意见，他也较坦诚。他说：“伯父，您的这部剧作好在写得严谨，主要历史事件、主要历史人物处处有出处。情节发展原原本本，脉络十分清楚。不过，剧本本身可能长了一些，搬上舞台的话，至少要七八个小时，才能全部演完。您如果允许的话，我可以冒昧帮您再作一些删削。”这段时间，曹禺经常陪郑烈吃饭、喝酒、聊天，亲密无间。未来的翁婿越谈越投机。1987年，郑秀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对笔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父亲后来喜欢曹禺甚至超过了喜欢我。”当时，他们在南京由郑烈主持

订了婚。

1937年10月，在战乱中，在双方父母的电报祝福下，曹禺与郑秀在长沙喜结连理。从30年代到40年代，曹禺希望民族富强、国家要立足于世界的崇高理想始终与岳飞和郑烈的心是相通的，与辛亥先烈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

别生父郑秀泪洒机场

1948年冬天，北平解放，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上海龙华机场，一架即将起飞的专机孤零零地停在跑道上。郑秀一个人站在飞机旁，焦急地向机场入口处张望。

“颖如，你还在望什么？”父亲郑烈焦急地问。“你不是说通知家宝与我们一起去台湾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

“谁知道呢，也许他碰上什么事……”郑烈含糊地搪塞着，其实他也不知道曹禺住在何处，根本就没人去接曹禺。为了让女儿跟自己一起离开大陆，郑父曾四次动员女儿。

1947年，曹禺从美国讲学回国后一直在上海工作，一度在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今上海戏剧学院前身）任教，后经黄佐临介绍，担任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创作并导演了电影《艳阳天》。此时，郑秀则带着万黛、万昭两个女儿住在南京，偶尔到上海小住，也总是很快返回南京，因为她在南京就业。

时局紧张以后，当局通知郑烈携全家撤往台湾。这使郑秀感到十分为难。一头是父亲，一头是丈夫，哪一头都依依不舍。她爱曹禺，父亲说已通知曹禺同行，她这才同意动身。

现如今见不到曹禺，郑秀心中一阵酸痛，但又决然地说：“爸，女儿不孝，我不能跟您走。”说着她含泪拉着两个女儿，转身就往出口处走。“颖如，颖如！你给我回来！回来！”郑父嘶声力竭地叫着，郑秀和两个孩子噙着泪，一步一回头地走出机场，她就这样和父亲一诀成永别了。

不思量，自难忘

由于性格不合等复杂的原因，郑秀与曹禺之间的感情逐渐疏远了。两人关系时好时坏，长期过着分居的生活。已远赴台湾的郑烈也成了横在两人头上的一片阴影。

1950年春，曹禺向郑秀提出了离婚的要求。1951年春，为了让这对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夫妻好合好散，减轻感情上的痛苦，郑秀所在的单位人民银行经济研究处和曹禺所在的单位中央戏剧学院共同商议，决定在中央戏剧学院会议室举行一个协议离婚仪式。曹禺、郑秀协议离婚手续的见证人，男方是欧阳予倩夫妇，女方陪同郑秀去的是周有光夫人张允和。协议内容规定，曹禺给两个孩子抚养费，每人每月三十元，到十八岁成人为止。

协议离婚裁判文书刚一念完，郑秀忍不住放声大哭。想到两人当年月下定情，岳父郑烈南京主持订婚和八年离乱中共同经历的艰难岁月，曹禺也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来，百感交集。

改革开放后，一位德国著名记者乌苇多次采访曹禺，以《戏剧家曹禺》为题，发表了采访长文。在这次采访中，沉默了30多年的曹禺第一次向外国朋友谈起了他与岳父郑烈的交往，流露出真挚的缅怀之情。“不思量，自难忘。”历史是不可能割断的，血浓于水，民族的感情、爱国的感情、骨肉的感情更是无法切断的。

曹树钧《新民周刊》